

關於金瑱瑯靶碗

謝明良

本文主要依據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提示了日本陽明文庫藏〈金瑱瑯有蓋把碗〉可能是雍正皇帝賞賜琉球國王的禮物，再由琉球國交予日本薩摩藩。另外，清宮傳世的一批十七至十八世紀日本鎖國時期伊萬里陶瓷，則可能是琉球國得自薩摩而後進獻清廷的朝貢物。

頃於京都國立博物館展出的「魅惑の清朝陶磁」是具有明確問題意識、令人耳目一新的專題展。相對於以往以時代區分的陶瓷展觀多傾向於名品的蒐集羅列，此次特展則是以清朝陶瓷和日本為呈現主軸，並設定「唐船交易」、「江戸、京都、長崎出土標本」、「獨特管道」、「日本定製」、「舊家傳世品」、「江戸時

期中國趣味」、「清代陶瓷和近代日本」等子題，經由相應的解說和精心挑選的陶瓷標本，生動地烘托出清代陶瓷於當時日本各消費面向兼及兩國陶藝的影響和交流，是一個平易近人同時又有學術關懷的成功策劃，其詳細可參見同時刊行的特展圖錄。（註一）展出作品所傳達出的議題極為豐富，其中包括陽明文庫傳世的一件

清代官窯〈金瑱瑯有蓋把碗〉（此次特展定名為〈金瑱瑯高足杯〉），以及今日日本沖繩即當時琉球國首里城等遺址出土的康熙朝（一六六二～一七二二）、雍正朝（一七二三～一七三五）景德鎮官窯瓷片。一般而言，日本在滿清入關前數年的寬永十六年（一六三九）與葡萄牙斷交（第五次鎖國令）正式完成政經分離

的鎖國，迄明治四年（一八七二）日清締結友好條約之前，日本和清國並無正式邦交，因此上述日本舊家傳世或琉球出土的清代官窯標本到底是透過什麼樣的管道得以傳入？就格外引人留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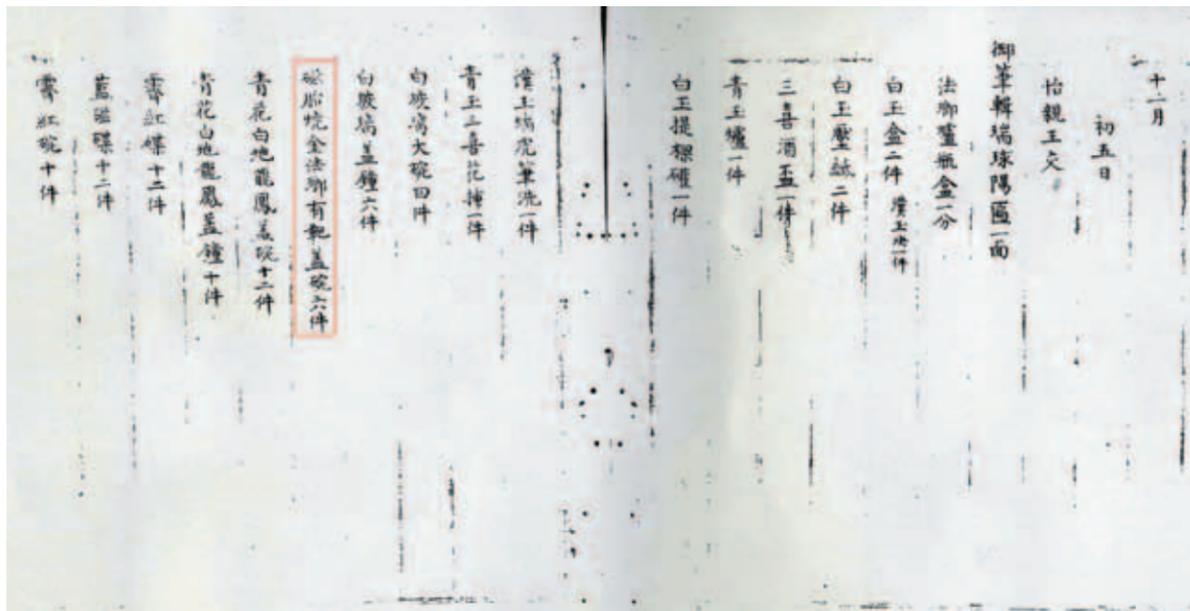
《槐記》所見「金瑱瑯有蓋把碗」
座落於京都的陽明文庫是近衛家第三十代傳人，曾三任內閣總理大臣的近衛文麿（一八九一～一九四五）於昭和十三年（一九三八）所創設的

文化機構，文庫中皮藏有自日本平安朝以迄明治、大正、昭和時期的十多萬件包括近衛家數位關白甚至天皇御筆在內的古文書等文物，此次特展特別挑選了其中一件近衛家藏（一六六七～一七三六）茶會時所使用的清代景德鎮官窯〈金瑱瑯有蓋把碗〉（圖一），是以往日方學者經常提及之來源可信、流傳有緒的著名作品。《槐記》的作者山科道安（一六七七～一七四六）是江戶中期攝政關白太政大臣近衛家熙（一六六七～一七三六）的家醫，



圖一 金瑱瑯有蓋把碗 陽明文庫藏近衛家傳世品 引自《魅惑の清朝陶磁》

《槐記》是他觀察記錄家熙本人行狀及茶、花、香道活動的輯錄，其作為第一手史料向來為學界所重視。其中，提及享保十三年（一七二八）四月三日舉行茶會時，用來裝盛茶點的「御茶菓入」之下方有如下的注記：「金瑱瑯有蓋把碗、阿蘭陀ノ燒物ナリ、先年薩州ヨリ獻上、關白様ヨリ進ゼラル」。從字面上看來，這件「金瑱瑯有蓋把碗」入藏近衛家的經緯可有二解，其一是九州薩摩即島津家獻呈近衛家熙，而後由家熙轉予



圖二 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雍正二年記事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微卷編號061-312-567

時任關白的嫡子近衛家久（一六八七—一七三七）。（註二）另一則是其原是島津家上獻關白近衛家久，再由家久奉呈父親近衛家熙的獻物。（註三）無論如何，是由島津家所獻呈的貢物。問題是《槐記》為何會將該明顯來自景德鎮的「金瑱瑯有蓋把碗」視為「阿蘭陀ノ燒物」（荷蘭陶瓷）呢？相對於以往學者對此若非略而不談，或即暗付此係《槐記》的誤解？此次特展策展人尾野善裕則依據沖繩當地傳聞而聲稱琉球人往往以「うらんだー」一詞來指稱外國，因此前述《槐記》所見「阿蘭陀」一詞就未必是指歐洲的荷蘭，至於所謂「阿蘭陀ノ燒物」也可能是「外國陶瓷」的泛稱，只是當時不明就裡的日本本島薩摩或京都人卻因其諧音而將之理解成了「荷蘭陶瓷」。（註四）尾野說法堪稱新穎有趣，可惜並未出示江戸時代琉球人以「うらんだー」指稱「外國」之具體事例，遑論康熙二年（一六六三）清封使張學禮赴琉球冊封，以來兩年一次定期朝貢的琉球國人會以「うらんだー」來稱呼「清

國」？

清宮造辦處檔案所見「磁胎燒金法瑯有靶蓋碗」及其他

陽明文庫收藏的〈金瑱瑯有蓋把碗〉，通高二十一公分，口徑十五·七公分，足徑四·二公分，除高足著地處外滿施白釉，並於器表覆以金彩。碗蓋安雞形鏤空鈕，碗心陰刻篆體「壽」字，其與內壁等距陰刻的「萬」、「齊」等四字相互輝映，製作極為精美。不過，以往日方學者對於該今日俗稱為高足杯的把碗內壁所見暗花文字之識讀以及把碗的燒成年代卻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說，一九五〇年代藤岡了一認為碗內壁四字應讀作「天壽」、「齊萬」，年代約在明代初期；（註五）一九八〇年代長谷部樂爾則將文字讀為「天」、「壽」、「齊」、「萬」，推測其年代晚迄清代嘉慶年（註六）；此次特展圖錄認為係十八世紀景德鎮官窯製品，碗內壁陰刻的是「萬」、「天」、「青」、「齊」四字。對於把碗的年代和暗花文字識讀因人而異，頗為分歧。

在此，我想提示清宮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相關記事無疑是理解〈金瑱瑯有蓋把碗〉年代、名稱、甚至是傳入日本途徑時的關鍵史料。如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匣作」載：「于十月二十八日做紫檀木博古書格二個呈進訖，磁胎燒金法瑯有蓋把碗六件配匣」；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法瑯作」亦載：

「十二月初五日，怡親王交，御筆輯瑞球陽區一面：磁胎燒金法瑯有靶蓋碗六件」（圖二）（註七），所謂「有靶蓋碗」即今日俗稱的帶蓋高足杯或高足碗，「磁胎燒金法瑯有靶蓋碗」應即山科道安《槐記》所載「金瑱瑯有蓋把碗」一類的製品，後者收貯於木箱，箱蓋面墨書「金瑱瑯 磁胎燒」。從造辦處的檔案記事看來「磁



圖三 磁胎燒金瑱瑯三羊開泰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胎燒」是相對於金屬質材「金胎」燒瑱瑯的用語，據此可知近衛家木箱墨書品名題簽完全符合清宮的用法，故其和《槐記》〈金瑱瑯有蓋把碗〉之稱謂，顯然並非日本藏家的創意，而是承襲自清宮的命名。應予一提的是，《槐記》提到該〈金瑱瑯有蓋把碗〉乃是享保十三年（一七二八）茶會時用來裝盛茶點的道具，享保十三年即雍正六年，看來陽明文庫藏近衛家傳世的這件金瑱瑯把碗的年代或可上溯雍正時期。另外，養心殿造辦處「法瑯作」記載「鍍金人王老格」（註八），王老格其人應是職司磁胎金瑱瑯覆金或銅胎鑲金工藝的專業匠人。無論如何，按照清宮的分類，「磁胎燒金法瑯」即泥金的瑱瑯瓷。依此脈絡，則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之所謂金彩或洋彩〈三羊開泰瓶〉（圖三），也可歸入「磁胎燒金法瑯」一類。

「磁胎燒金法瑯有蓋把碗」之外，清宮造辦處檔案亦見多筆「金胎法瑯靶碗」或加施其他裝飾的瓷質帶蓋高足碗。如乾隆五十二年



圖五 乾隆款紅龍白地天雞頂有蓋靶碗 天津博物館藏 引自天津博物館編，《天津博物館藏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圖168。



圖六 雍正門彩天雞頂蓋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馮先銘等，《清盛世瓷選粹》，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4，圖19。

後委員會的定年，將之視為康熙朝製品，上引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同圖四）也被該院人員定年於康熙朝，本文雖傾向認為這類無款高足碗的相對年代或可上溯乾隆朝之前雍正甚至康熙時期，而造型與之相近的〈金法瑯有靶蓋碗〉亦屬同一時段作品，但並無確證。無論如何，晚迄嘉慶九年（一八〇四）九江官監督亦曾恭進類

似器式的礬紅高足碗，而前述雍正朝「磁胎燒金法瑯有靶蓋碗」蓋上的雞形鈕當可據檔案的記載而正名為「天雞頂」，造型相近的「天雞頂」亦見於雍正朝門彩蓋碗。（圖六）我並未上手目驗近衛家傳世的〈金瑛瑯有蓋把碗〉，只能從圖版及相關解說對作品進行間接的理解，不過國立故宮博物院卻收藏有幾件極可

能與近衛家傳世靶碗於釉彩、形制以及內壁由雲龍暗花夾飾文字等各方面均完全一致的作品（圖七），從典藏號得知故宮藏品的原係收貯於清宮景祺閣。（註十）參酌前引乾隆五十二年「紅龍白地天雞頂有蓋靶碗」是奉旨交予佛堂之物，可知此類帶蓋靶碗有的是做為佛前的供養道具。就故宮藏金瑛瑯有蓋靶碗的外觀特徵而言，

（一七七七）「記事錄」：「十二月十八日：將九江關送到紅龍白地天雞頂有蓋靶碗四十件（隨做樣碗一件，年貢二十件，吉祥交進二十件）呈覽，奉旨交佛堂，欽此。」（微卷Box.No.147, pp. 434-435）：乾隆五十五年

（一七九〇）「初六日，接得熱河寄來信帖一件，內開七月二十五日太監鄂魯里交，紅龍白地天雞頂有蓋靶碗一件（係熱河芳園居庫收）。」（微卷Box.No.150, pp. 400-401）所謂「紅龍白地天雞頂有蓋靶碗」其實見於國內

而高宗乾隆皇帝也不只一次地下詔命景德鎮御窯廠燒「紅龍白地天雞頂有蓋靶碗」，故上述造型方面的差異是否由於朝代不同所造成？抑或只是乾隆朝不同時段所燒製的作品？還有待確認。過去，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無款白地紅龍高足蓋碗承襲了民初清室善



圖四 白地紅龍帶蓋高足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李毅華編，《故宮珍藏康熙乾隆瓷器圖錄》，香港：大業公司，1989，圖67。

外公私收藏，如瑞士Baur Collection、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天津博物館或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均有收藏，其中北京故宮博物院藏無款靶碗碗心描紅壽字（圖四）；天津博物館和瑞士Baur Collection藏品則於蓋內和碗心書礬紅雙方框「大清乾隆年製」篆款。（圖五）就器形而言，北京故宮無款高足碗碗身下方近高足處造型呈圓弧，而Baur Collection和天津博物館帶乾隆年款的碗身下部收斂較劇，且蓋頂天雞捉手的造型特徵也和北京故宮無款藏品略有出入。從造辦處檔案看來，早在雍正四年（一七二六）就曾以「紅龍高足有蓋茶碗」賞琉球國；雍正七年（一七二九）世宗皇帝賞賜班產厄爾得尼或達賴喇嘛的物件亦見「紅龍白磁有蓋靶碗」（註九），



圖八 刻有乾隆御製詩的漢代「長樂」穀紋玉璧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玉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玉器全集》卷一·漢—南北朝，香港：錦年國際有限公司，1994，圖266。



圖七 線描圖 陳卉秀摹繪



圖七 金珫瑯靶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高足著地處和蓋內裏中央部位無釉，餘施略閃青的白釉，蓋碗器表另於白釉之上施金彩。碗心陰刻「壽」字，內壁等距依上、下、右、左順序陰刻由暗花雙龍拱簇的「萬」、「壽」、「齊」、「天」雙鈎篆字，品相高逸，作工極為講究，從螭龍造型及其和文字的布局安排等看來，其裝飾構思有可能是受到漢代玉璧意匠的啟發。（圖八）應予一提的是，早在一九六〇年代臺灣故宮籌備編寫《故宮瓷器錄》時已將所收藏的幾件金珫瑯靶碗定名為〈清官窯泥金釉萬壽齊天高足蓋碗〉。「萬壽齊天」指的是碗內壁所見之意謂其壽與天同高的吉祥文句，也是和碗心「壽」字相呼應的字銘，結合筆者的實物目驗可知應屬正確識讀，故前述日方學者對於陽明文庫藏近衛家傳世高足碗內壁暗花字銘的幾種辨識方案，均有訂正的必要。

清代官窯傳入日本途徑相關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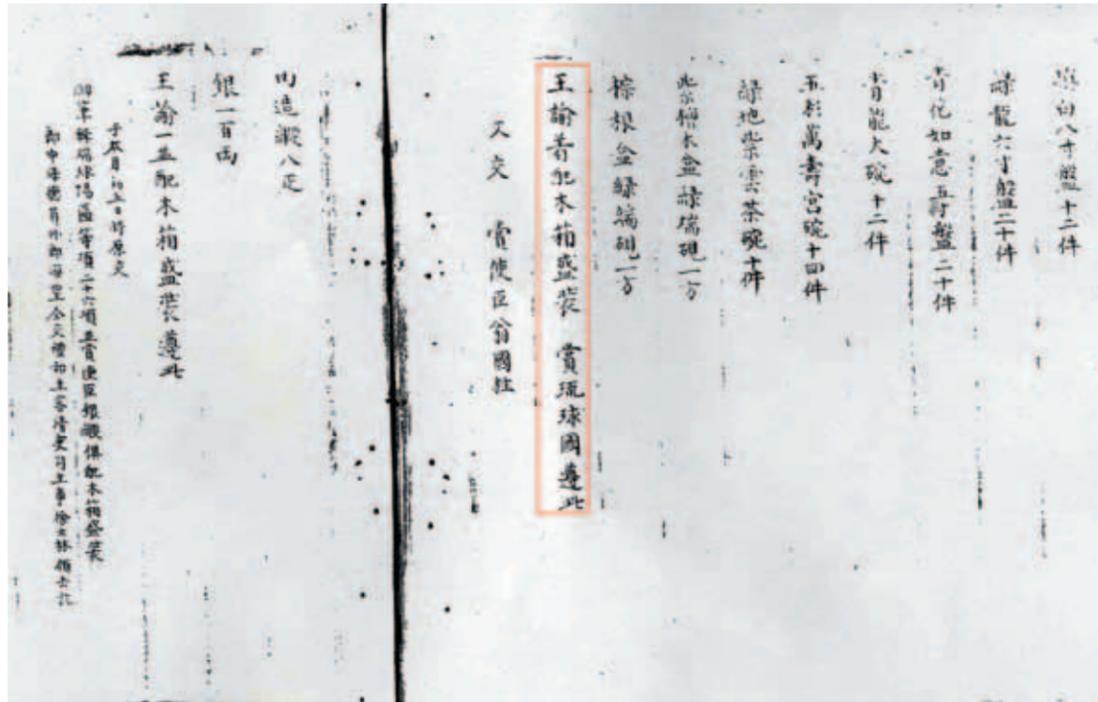
如前所述，日本自寬永十六年

（一六三九）與葡萄牙斷交採取政經分離的鎖國政策，其雖避免與清朝正式國交，實際上仍開放長崎港供清國和荷蘭人前來貿易，此次特展亦規劃收入部分長崎出土或經由長崎再轉送京都、大阪等地的傳世或出土陶瓷標本。問題是，陽明文庫藏近衛家傳世的〈金珫瑯有蓋把碗〉因屬清代景德鎮御窯廠燒造的官窯製品，故其傳入途徑委實耐人尋味。《魅惑の清朝陶磁》特展圖錄〈獨自の回路〉多少也是針對日本獲得官窯之特殊管道而設立的專章。山科道安《槐記》已經提到近衛家茶會的〈金珫瑯有蓋把碗〉乃是九州薩摩即島津家所進獻，而薩摩藩於慶長十四年（一六〇九）在幕府首肯之下以武力的方式間接地掌控了琉球國，但琉球國卻刻意對清廷隱瞞其與日本（薩摩）的交往，貌合神離地持續自明代洪武時期以來的朝貢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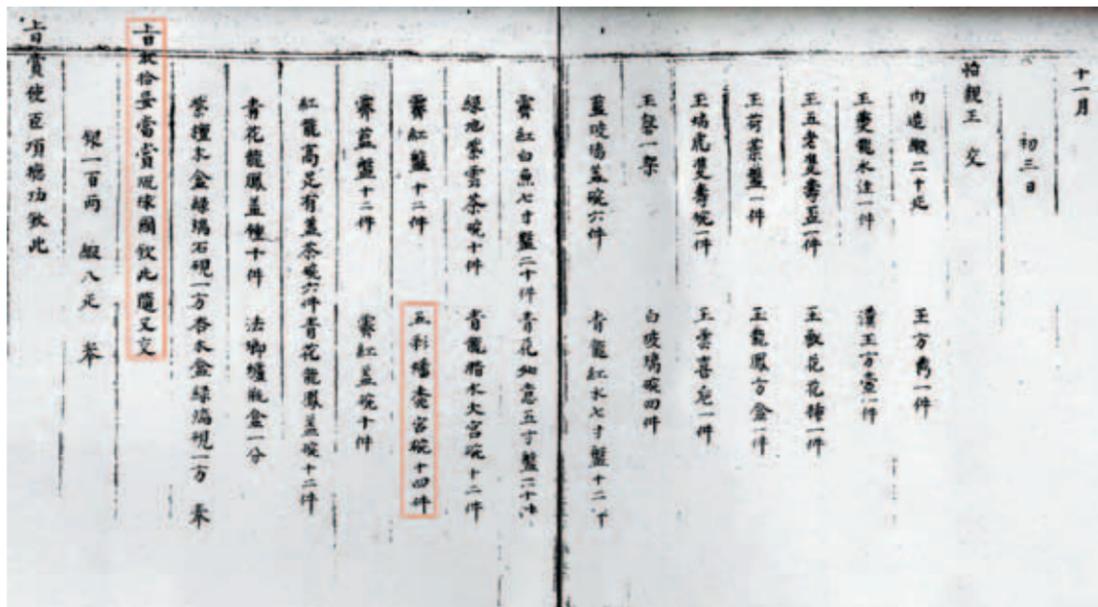
考慮到這樣的歷史情境，尾野善裕遂結合近年琉球王宮首里城、廢藩設縣後之原國王邸宅等遺址出土的清代官窯標本（圖九、十、十一），極

力主張薩摩藩用以獻呈天皇或高階公家的清代官窯應是得自清國授予琉球國的賞賜品，並且援引年代晚迄文化四年（一八〇七，清嘉慶十二年）琉球館文書當中，有關薩摩藩質疑琉球國攜來之「官窯」品質惡劣、疑為贗品的記事來說明清代官窯經由琉球國輾轉傳入日本之情事。（註十二）

我認為，尾野的推論極為合理，但仍有可予補強之處。首先，前引雍正二年（一七二四）「法瑯作」所載由怡親王交付的六件「磁胎燒金法瑯有靶蓋碗」乃是隨「御筆輯瑞球陽匾」、「五彩萬壽宮碗」等計二十六項物件，在「配木箱盛裝」後交由琉球國正使翁國柱賞賜琉球國王的禮物（圖十二）此一賞賜清單亦見於《歷代寶案》（沖繩縣立圖書館編，校訂本二集，卷十四之十二號文），而「磁胎燒金法瑯有靶蓋碗」應即《槐記》所載近衛家〈金珫瑯有蓋把碗〉（同圖一）一類作品已如前所述。其次，雍正四年（一七二六）「記事錄」記載的賞賜琉球國的清單中不僅包括「紅龍高足有蓋茶碗六件」，另



圖十二 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雍正二年記事 微卷編號 061-313-567



圖十三 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 雍正四年記事 微卷編號 064-77-556

見「五彩蟠桃宮碗十四件」等官窯瓷器（圖十三），從字面推敲，其有可能正是沖繩真珠道遺址出土之碗心以青花勾勒桃形再於其中書「壽」字之今日俗稱鬥彩的康熙朝官窯標本。（同圖十）如果上述推測無誤，則可

結合康熙皇帝賞賜琉球國王物件多限於緞絨羅錦等織品之情事，反證雍正二年賞琉球國的瓷器當中也包括了前代康熙朝的製品。另外，中城御殿遺址出土的雍正朝瓷片（同圖十一）亦可依據傳世雍正官窯得知其可能原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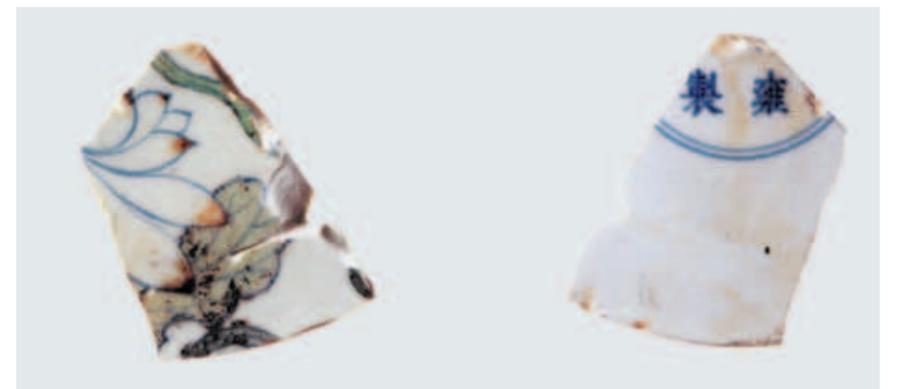
繪飾著蓮池鴛鴦紋。（圖十四）事實上，琉球國不僅屢次以日本薩摩藩提供的金、銀、銅、鐵等物進獻清國（註十二），也以清國製品或利用清國物料在琉球加工的物品赴江戶獻呈幕府。如《舊記雜錄追尋》所



圖九 沖繩首里城遺址出土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 引自《魅惑の清朝陶磁》；仲座久宜等，《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調査報告書第54集首里城跡一御内原北地區發掘調査報告書（I）》，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10。



圖十 沖繩真珠道遺址出土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 引自《魅惑の清朝陶磁》；轉引原報告知念隆博等，《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調査報告書第32集真珠道跡一首里城跡真珠道地 發掘調査報告書（I）》，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6。



圖十一 沖繩中城御殿遺址出土 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藏 引自《魅惑の清朝陶磁》；轉引原報告見新垣力，《沖繩出土の清朝陶磁》，《沖繩埋文研究》1，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03；仲座久宜等，《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調査報告書第58集中城御殿跡一縣營首里城公園中城御殿跡發掘調査報告書（2）》，沖繩縣立埋藏文化財センター，2011。

定州花瓷

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

Decorated Porcelains of Dingzhou
White Ding War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國立故宮博物院正館 Gallery 203

2013 11/30 - 2014 09/30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週六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00.

《定州花瓷：院藏定窯系白瓷特展圖錄》於本院禮品部販售



圖十四 雍正款鬥彩蓮池鴛鴦紋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前引馮先銘等，《清盛世瓷選粹》，圖21。

註釋

1.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魅惑の清朝陶磁》，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等，2013。
2. 細川護貞，〈金瑛の辿った道〉，《陶說》389，1985年8月，頁14-15。以及同氏，〈目迷五色〉，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頁176-177「嘉慶・白磁馬上杯」的解說。
3. 尾野善裕，〈「金瑛」と呼ばれた器〉，《王朝文化の華・陽明文庫名寶展—宮廷貴族近衛家の一千年》，NHK等，2012，頁194-196。
4. 尾野善裕，〈うらんだーとやちむん「金瑛」〉，《京都國立博物館だより》176，2012；〈清朝官窯と近世日本〉，《陶說》728，2013年11月，頁22-23。
5. 藤岡了一，〈明初・金瑛禽鈕高足杯〉，《世界陶磁全集》元明，東京：河出書房，1955，頁299圖95「解說」。
6. 長谷部樂爾，〈金彩鳳凰鈕蓋高足杯〉，《世界陶磁全集》清，東京：小學館，1983，頁282圖294「解說」。
7. 本文所引用清宮造辦處檔案多是依據先前國立故宮博物院購置的微卷，但近年中國也已發行紙本。參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共55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清宮檔案全集》共52冊，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
8. 朱家潛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前言〉，頁5。
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前引《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一，頁56及頁111。
10. 清室善後委員會，《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店版，2002，8冊，頁26。此承蒙國立故宮博物院余佩瑾研究員的教示，謹誌謝意。
11. 尾野善裕，前引〈清朝官窯と近世日本〉，頁23-24；京都國立博物館編，前引《魅惑の清朝陶磁》，頁13-15。
12. 宮田俊彦，《琉球・清國交易史—二集《歷代寶案》の研究》，東京：第一書房，1984，頁27-28。
13. 宮城榮昌，《琉球使者の江戸上り》，東京：第一書房，1982，頁111-113。
14. 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伊萬里瓷器〉，原載《故宮學術季刊》14卷3期，1997，收入《中國陶瓷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2005，頁137-169。

載島津繼豐提交幕府的文書中就提到，日延享二年（一七四五）琉球使節赴江戶所攜貢品之中，包括了借由琉球使節赴中國朝貢之際，於北京返回福州途中所獲得的物品；《琉球王使參上記》所收島津重豪呈交幕府的文書也記載，琉球慶賀使原本預定在日寶曆十二年（一七六二）獻呈德川家治將軍中國製賀禮，卻由於寶曆十年（一七六〇）未獲清廷允許入貢，無法取得中國物品，致使攜帶中國產之

賀禮上江戶謁見一事要遲至明和元年（一七六四）才如願以償。（註十三）上述史實表明了琉球於鎖國時期的日清交流史上曾經扮演著中介的角色，其以靈活的外交手腕穿梭周旋於日本和清國之間，並經由與兩造的進貢活動，促使包括工藝美術工藝品在內的兩國物資得以進行間接的交流，而現

藏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批清宮傳世十七至十八世紀日本鎖國時期伊萬里陶瓷，也有可能是琉球國得自薩摩再由琉球使節獻予清廷的朝貢物。（註十四）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